



烟台故事

怀故人

奇山所军事指挥机关应该叫“所厅”

彭守业



挂在张氏宗祠门口的牌匾

明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），皇帝朱元璋准奏设立“奇山守御千户所”。奇山所成立后，修建了“周两里，高二丈，门四，楼铺十六，池阔三丈五尺，深一丈”的城池，称为“所城”，驻军满员应为1120人。那么，明朝时奇山所的军事指挥机关叫什么名字呢？

1983年，《烟台文史资料》第二辑上刊登了张星坡先生的文章《烟台奇山所往昔忆》。该文写道：奇山所的军事指挥机关所厅位于北门里，即现在所城里东北角的永发胡同一带，遗址早已不存，已建平房若干。张星坡先生是明朝奇山所副千户张升之后裔，出生于民国初年，世居所城里，上学时喜读史书，对乡土掌故尤感兴趣，常向长辈和知者求问，下学后曾参与族里和村里的政事，又担任过北门里村（所城里四村之一）自治会会首。他对奇山所城的了解颇深入，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涉及奇山所指挥机关名称的文章。后了解到，所城张家居住在永发胡同一带的老人称这里为“所厅家”，我分析“所厅家”的意思是：在原所厅遗址上建的房子。

后来，我在采访所城刘家二十世孙、人称“烟台通”的刘树厚老人时，刘老也称奇山所指挥机关是“所厅”。许是先入为主吧，此后一段时间，我比较认可“所厅”的叫法。

不过，不久后有所城张家的先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，称奇山所军事指挥机关叫“所城衙门”，简称“所衙”，而且称位于所城里西北角的张氏宗祠，明朝时就是“所城衙门”。前几年，他们自己做了一块牌匾挂在张氏宗祠大门口，宣称这就是始建于明朝宣德六年的“千户官衙”。将建于清朝时的张氏宗祠说成是明朝奇山所指挥机关，在我看来是非常荒谬的，同时我也不可能接受奇山所指挥机关叫“所城衙门”的说法：“衙门”是封建社会县以上官府办公场所，奇山所是军事机构，怎么能叫衙门呢？

后来，我写了《张氏祠堂是原奇山所厅吗》一文发表在2014年7月22日的《烟台晚报》上，文章列出多条理由证明张氏宗祠根本不可能是明朝奇山

所指挥机关。从文章的题目看，我当时是肯定“所厅”的叫法而否定“所衙”的。

所城刘家的一位老先生也不同意“所衙”的说法，但他认为应该叫“千户府”。这个说法我同样不能接受：“府”是过去达官贵人的住处，“千户”是奇山所的最高指挥官，当年所城即使有“千户府”，也应该是奇山所千户的官邸，而不是指挥机关。

又有在《芝罘历史文化丛刊》上发表的关于奇山所的文章中分析认为，奇山所的指挥机关应该叫“署”。民间俗称“千户衙门”，但民间称呼本来就不一定准确。

说法一多，我自己也拿不准了，后来我就这一问题请教了包括大学明史教授在内的多人，都没有明确答复。之后，我再写关于奇山所的文章时就谨慎了，不敢称“所厅”，而是笼统地称为“奇山所指挥机关”。

去年年底，我应邀为威海市南郊的长峰村编修村志，为了编写一部有价值的志书，我翻阅了《威海市志》及不少涉及老威海市历史的刊物。威海市城市历史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《威海记忆》第三十三辑刊发的耿祥星先生的《威海卫职官变迁》一文，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文章说：根据康熙及乾隆《威海卫志》记载“威海卫辖左前、后三个千户所。左所、前所无专城，所厅附卫治。后所即百尺崖所，有城，所厅置所城内”。文章明确地说，威海卫下辖的三个所城的指挥机关是“所厅”。

我打电话给《威海记忆》编辑丛领滋老师，询问这是耿祥星先生的个人说法呢还是康熙及乾隆版《威海卫志》有记载呢？熟知威海卫历史的丛老师很肯定地说，《威海卫志》里有关于三个所厅的明确记载。随后，丛老师给我转发了乾隆版《威海卫志》关于三个所厅的文字图片。

转了一个圈，事情又回到了原点——威海卫下辖的所机关叫“所厅”，那么奇山所指挥机关也应该是“所厅”，而不可能是“所衙”“千户府”“所署”或其他名称，40年前张星坡等人的说法是正确的！

我那倚拐守望村头的母亲

王京波

母亲在世时，周末我肯定回家，心里总感觉回到母亲身边才是家。

几乎每次，我从公交车上走下来，都会远远看到村头的母亲向西眺望、倚拐蹒跚的身影。人到中年，还有老母亲时刻牵挂着你，那份甜蜜、那份喜悦、那份珍贵，人生难得。记得父亲在时，有父亲在街头坐着小凳等我回家；父亲走了，换上母亲依拐蹒跚的影子。现在父母都走了，我偶回老家，走近村头就禁不住眼角盈泪，一种孤凄蓦地攫取心头，我那倚拐蹒跚，见到儿子就颤拐喜不可支的母亲呢？

母亲去世得很突然，是半夜发病。当我跟着急救车赶到母亲身边时，母亲只有喘息的声音，已失去了意识。第二天，母亲安详地走了，那是2009年3月12日上午9时半，享年82岁。母亲去世时，没有顾盼簇拥在身边的七个儿女一眼，没来得及跟一个儿女说上一句话。

母亲19岁出嫁，共生育我们兄弟姊妹八个，有一个大哥早早夭折。父母是以在炕头上找人、在饭桌上点数的方式抚养我们的。父母两个人在生产队挣工分，养活我们七个嗷嗷待哺的孩子，还要赡养我年迈的奶奶，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。

当年母亲在生产队干义工是八成劳力，但包工却能拿到十成的工分。夏忙拔小麦，秋忙撬玉米，农田的任何粗活，母亲不亚于生产队的男丁；生产队安排妇女往农田里送粪，母亲自己摸黑起来，弓腰推着满满一木车积粪，颠簸在坑坑洼洼十几里山路上，早上一趟，上午两趟，下午两趟，这样一天下来能挣十二个工分，生产队的壮劳力也不过如此。

白天忙累了一天，晚上母亲也不能歇息，一家老小十个人那么多的事，这个孩子哭着要缝裤子，那个孩子闹着要钉扣子，还有大堆衣服需要浆洗。母亲那时一年四季能够歇息的时间很少，临近春节，生产队放假，但家里还有大堆的孩子等着母亲的付出，七个孩子每人一套过年的新衣新裤新鞋，大部分靠母亲缝制。仅仅纳织七个孩子的布鞋，母亲不知要在煤油灯下熬几个深夜，祖传的小蒲篓里非要纳织满满一堆才够用。我至今对我小时候穿姐姐们穿小的旧衣服还记忆犹新，因为那时同伴常嘲笑我男孩子穿女装。开始我还在母亲面前委屈过，后来我索性不怕同伴嘲笑了。

记得有一年冬天，我的棉裤不知怎么的，裆部没了棉花，只有两层布，冻得受不了。我找母亲说，母亲开始忙乱得没理会我，大约在第二天的晚上，母亲在炕头上忽然看到我棉裤裆部果然空空的，哎呀叫了一声，眼角就涌出了泪花。那天晚上，母亲连夜给我赶

补了棉裤。

为了多挣工分养家糊口，母亲年年报名到村里的集体孵化鸡场去收鸡蛋。母亲在生产队劳动是能手，为村孵化鸡场收鸡蛋也是快手。收鸡蛋的活不是好做的，要一村一巷、一家一户地走。附近的村庄收鸡蛋的人去得勤、收得少，母亲就到人迹罕至的山村去收，往往一天下来收获颇丰。母亲不会骑自行车，一山一坡，一沟一坎，全凭自己两条腿，一路上还要小心翼翼拐着几十斤重的鸡蛋篓。那些日子，母亲每天都是清早我尚在酣睡之中，就拐着篓离家上路；当入夜我已进入梦乡，母亲才姗姗而归，所以我整天很少见到母亲的影子。为了多走几个村，多走几家，多收一些鸡蛋，母亲往往是赶到饭时，就啃几口随身携带的硬棒玉米饼，走到谁家，碰到好心人还会在人家家里喝几口菜汤。母亲老了以后，得了久治不愈的干咳病，医生曾告诉过我，原因跟母亲年轻时失饭有关。

母亲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，正是我年幼混沌之时，在我成年以后，母亲很少跟我提及往事。只有一次，那是父亲去世不久，说起她和父亲经历的生活苦难，母亲下意识地摇着头，对我说了一件她一生忘不了也不爱想的往事。有一年，生产队安排她们妇女往30多里外的金城用单轮木车送煤，每车煤300斤。母亲推一车300斤的煤送到30多里外的金城，空着木车往返，走到朱桥，饿得再也走不动了。原来，受母亲和奶奶之托给母亲送饭的那个人走岔了路，无奈的母亲只好空手进了饭店，四下寻找人家烩玉米饼子剩下的饭汤喝……

母亲是个贤惠人，老了以后从不愿意给子女添太多的麻烦。母亲70多岁的时候犯了腿疼病。开始我问母亲，母亲总说没事，而背地却疼得悄悄流泪，后经我们四处求医，终于痊愈。以后母亲又得了心衰、冠心病、心脏病，医生对我说，老人要好好保养，可母亲总是宽慰我说没事没事的，总怕我为她担心。

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哪个孩子的家里都不去，坚持一人守着浸满了她和父亲生活印记的老宅。在我们姊妹七人为父亲“守七”的日子里，母亲时常一句话不说，自己孤独地坐在炕下的太师椅上。一次，母亲饲养的家猫去蹭偎母亲的裤角，母亲就用拐捅着家猫，轻声自语道“以后就剩你和我做伴了”。四姐无意听到了母亲的呢喃，顿时泪如泉涌，躲到一旁哭泣。母亲去世后，无人喂养、无人问津的家猫半年多没有离开我家那已阒无一人的老宅。

母亲走了，母亲割走了我一块心，每每想到母亲，我总感觉自己对母亲有太多太多的愧疚，还有太多太多的遗憾。